

【现代贵州学术精品丛书】

中国文化史·中

柳诒徵 著



貴州大學出版社
Guizhou University Press

110203
1
2
【现代贵州学术精品丛书】

中国文化史·中

柳诒徵 著

贵州大学出版社
Guizhou University Press



第二编 中古文化史

第一章 中国文化中衰及印度文化东来之故

自太古至秦、汉，为吾国人创造文化及继续发达之时期。自汉以降，则为吾国文化中衰之时期。虽政治教育仍多沿古代之法而继续演进，且社会事物，亦时有创造发明，足以证人民之进化者。然自全体观之，则政教大纲不能出古代之范围，种族衰弱，时呈扰乱分割之状。虽吾民亦能以固有之文化，使异族同化于吾，要其发荣滋长之精神，较之太古及三代、秦、汉相去远矣。于此时期，有一大事足纪者，即印度之文化输入于吾国，而使吾国社会思想以及文艺、美术、建筑等皆生种种之变化。且吾民吸收之力，能使印度文化变为中国文化，传播发扬，且盛于其发源之地，是亦不可谓非吾民族之精神也。

治此期之历史，所当致疑者二事：吾国文化何以中衰乎？印度文化何故东来乎？欲解此二疑问，当就种种方面推究其原因。兹举其大者数端以明之。

（一）则坏于盗贼无赖也。秦以前，创业开国者多圣哲；秦以后，起事革命者多盗贼。盗贼无赖之徒，成则为帝王，固不识治国御世之道；败则肆焚掠，尤不解保护文化之谊。故自汉以来，增进文化之力，恒不及摧毁凿削之力之强。观隋牛弘论书之“五厄”，即可推知其故。

《隋书·牛弘传》：“弘以典籍遗逸，上表请开献书之路，曰：‘尧称至圣，犹考古道而言；舜其大智，尚观古人之象。’《周官》，外史掌三皇五

帝之书及四方之志。武王问黄帝、颛顼之道，太公曰：‘在《丹书》。’是知握符御历，有国有家者，曷尝不以《诗》《书》而为教，因礼乐而成功也。昔周德既衰，……及秦皇驭宇，……事不师古，始下焚书之令，行偶语之刑。先王坟籍，扫地皆尽，本既先亡，从而颠复。……此则书之一厄也^①。……及王莽之末，长安兵起，官室图书，并从焚烬。此则书之二厄也。……及孝献移都，吏民扰乱，图书缣帛，皆取为帷囊。所收而西，裁七十余乘，属西京大乱，一时燔荡。此则书之三厄也。……属刘、石凭陵，京华复灭，朝章国典，从而失坠。此则书之四厄也。……及侯景渡江，破灭梁室，秘省经籍，虽从兵火，其文德殿内书史，宛然犹存。萧绎……平侯景，收文德之书及公私典籍，重本七万余卷，悉送荆州。故江表图书，因斯尽萃于绎矣。及周师入郢，绎悉焚之于外城，所收才一二。此则书之五厄也。”

以官书例私家，以文籍例他事，则武人暴客，烈火利兵，实文化之大仇敌。民之憔悴呻吟于疮痍水火者，非从容休养，不能增益其文教。从容休养数百年或百数十年，即加以一大劫。如：

《隋书·牛弘传》载：“牛弘曰：‘仲尼以后，迄于当今，年逾千载，数遭五厄。’”^②

此其所以不但不能进步，而且日见退化之故也。

（二）则坏于科举利禄也。科举之制，为此时期之产物，发源于汉，而大备于唐。而其为弊亦即累积而不可返，史策所载，当时

① 此事须与第一编所引刘大槐《焚书辨》参看，实则秦书之焚，仍是项羽等所为也。

② 自项羽烧咸阳，至周师入魏，实七百六十年（自公元前206至公元554年）。此七百年中，大劫五，小劫尚不可胜计。

之人，论列其弊者夥矣。

《后汉书·左周黄列传》：“论曰：汉初诏举贤良方正，州郡察孝廉秀才，斯亦贡士之方也。中兴以后，复增敦朴、有道、贤能、直言、独行、高节、质直、清白、敦厚之属，荣路既广，觖望难裁。自是窃名伪服，浸以流竞。权门贵仕，请谒繁兴。”^①《旧唐书》薛登《论举人疏》：“今之举人，有乖事实。……或明制才出，试遣搜扬，驱驰府寺之门，出入王公之第。上启陈诗，唯希咳唾之泽；摩顶至足，冀荷提携之恩。故俗号举人，皆称觅举。觅为自求之称，未是人知之辞。……故选司补署，喧然于礼闱，州贡宾王，争讼于阶闑。谤议纷合，浸以成风。”又赵匡《举选议》：“国朝举选，用隋氏之制，岁月既久，其法益讹。夫才智因习就，固然之理。进士者时共贵之。主司褒贬，实在诗赋，务求巧丽，以此为贤，溺于所习，悉昧本原。欲以启导性灵，奖成后进，斯亦难矣。故士林鲜体国之论，其弊一也。又人之心智，盖有涯分，而九流七略，书籍无穷。主司征问，不立程限，故修习之时，但务钞略。比及就试，偶中是期，业无所成，固由于此。故当代寡人师之学，其弊二也。疏以释经，盖筌蹄耳。明经读书，勤劳已甚，既口问义，又诵疏文，徒竭其精华，习不急之业。而当代礼法，无不面墙，及临人决事，取辨胥吏之口而已。所谓所习非所用，所用非所习者也。故当官少称职之吏，其弊三也。”

虽科举考试，可以泯贵族平民之阶级，然以利禄诱人，奖竞召伪，大损人格，实与古代教育之义相反。夫人民止知尚利禄，而不尚道义，非独科举为害也，即行学校之制，亦足为害。班固论汉代学校，已斥其禄利劝人。

① 魏晋以降，多用九品中正举人，然亦常举行州郡孝秀之制，试以策问。梁沈约尝论之曰：“假使秀才对五问可称，孝廉答一策能过者，乃雕虫小道，非关理功得失。以此求才，徒虚语耳。”

《汉书·儒林传赞》：“自武帝立五经博士，开弟子员，设科射策，劝以官禄，讫于元始，百有余年，传业者浸盛，支叶蕃滋，一经说至百余万言，大师众至千余人，盖禄利之路然也。”

宋代尝有意于学校，然亦无非以利禄诱之。

《文献通考》：“宋熙丰复立三舍之法，不过试之以浮靡之文，而诱之以利禄之途。为士者，内耻于习业之未精，外诱于荣途之可慕，其坐学之日，自不容不久。”

是学校科举，名二而实一也。论者徒谓汉以后学校科举，一本儒术，故以国家社会之不进步，归咎儒家。实则教育之根本既歧，无论崇尚何种学术，皆不能免于腐败也。

（三）则宗教信仰之缺乏也。吾国国民脱离初民之迷信最早。唐、虞、三代之圣哲，专以人事言天道，即殷人尚鬼，有似于宗教性质，然其祭祀仍专重人鬼，无宗教家荒诞之说也。后之立国者，于政治教育不能尽饜人望，又无宗教以资其维系，则人心之饥渴，乃甚于原有宗教之国家。战国以来，神仙方士之说，因之以盛。

《史记·封禅书》：“自齐威、宣之时，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，及秦帝而齐人奏之，故始皇采用之。而宋毋忌、正伯侨、充尚、羡门高最后皆燕人，为方仙道，形解销化，依于鬼神之事。驺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，而燕、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，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，不可胜数也。自威、宣、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、方丈、瀛洲。此三神山者，其传在渤海中，去人不远；患且至，则船风引而去。盖尝有至者，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。其物禽兽尽白，而黄金银为宫阙。未至，望之如云；及到，三神山反居水下。临之，风辄引去，终莫能至云。世主莫不甘心焉。”

而其效不可睹。

《史记·封禅书》：“方士之候伺神人，入海求蓬莱，终无有验。而公孙卿之候神者，犹以大人之迹为解，无有效。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。然羁縻不绝，冀遇其真。自此之后，方士之言神祠者弥众。然其效可睹矣。”

东汉图讖、占候之学，与神仙、方技之说相混。《后汉书·方术列传》所载，有学星占图讖者^①，有治神仙方技者^②。而张角、张陵、张鲁之徒出。

《后汉书·皇甫嵩传》：“钜鹿张角，自称‘大贤良师’，奉事黄、老道，畜养子弟，跪拜首过，符水咒说以疗病，病者颇愈，百姓信向之。角因遣弟子八人，使于四方，以善道教化天下，转相诳惑。十余年间，众徒数十万，连结郡国，自青、徐、幽、冀、荆、扬、兖、豫八州之人，莫不毕应。遂置三十六方，……大方万余人，小方六七千，各立渠帅。讹言‘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。岁在甲子，天下大吉’。”《三国志·张鲁传》：“鲁祖父陵，客蜀，学道鹤鸣山中，造作道书，以惑百姓，从受道者出五斗米，故世号‘米贼’。陵死，子衡行其道。衡死，鲁复行之。……鲁遂据汉中，以鬼道教民，自号‘师君’。其来学道者，初皆名‘鬼卒’。受本道已信，号‘祭酒’，各领部众，多者为‘治头大祭酒’。皆教以诚信，不欺诈，有病自首其过，大都与黄巾相似。诸祭酒皆作义舍，如今之亭传。又置义米肉，悬于义舍，行路者量腹取足。若过多，鬼道辄病之。犯法者，三原，然后乃行刑。不置长吏，皆以祭酒为治，民夷便乐之。”

① 如唐檀、公沙穆、董扶之类。

② 如费长房、蓟子训之类。

其流为孙恩、卢循等。

《晋书·孙恩传》：“世奉五斗米道。恩叔父泰，字敬远，师事钱唐杜子恭。而子恭有秘术，尝就人借瓜刀，其主求之，子恭曰：‘当即相还耳。’既而刀主行至嘉兴，有鱼跃入船中，破鱼得瓜刀。其为神效，往往如此。子恭死，泰传其术，然浮狡有小才，诳诱百姓，愚者敬之如神。……泰见天下兵起，以为晋祚将终，乃扇动百姓，私集徒众，三吴士庶多从之。……会稽内史谢辄发其谋，道子诛之。恩逃于海。众闻泰死，惑之，皆谓蝉蜕登仙，故就海中资给。恩聚合亡命，得百余人，志欲复仇。会稽、吴郡等八郡，一时俱起，杀长吏以应之，旬日之中，众数十万。……于是恩据会稽，自号‘征东将军’，号其党曰‘长生人’。刘裕大破恩于沪渎，恩遂远遁海中。……恩穷蹙，乃赴海自沈。妖党及妓妾谓之水仙，投水从死者百数。余众复推恩妹夫卢循为主。”^①

要其为术，足以惑下愚而不足以启上智。而佛教当此时流入中国，正合于中国人心渴仰宗教之潮流。其始，虽仅以神异动颛愚。

《晋书·艺术传》：“佛图澄妙通玄术，……常服气自养，能积日不食。善诵神呪，能役使鬼神。腹旁有一孔，常以絮塞之。每夜读书，则拔絮，孔中出光，照于一室。又尝斋时，平旦至流水侧，从腹旁孔中，引出五脏六腑洗之。讫，还内腹中。又能听铃音以言吉凶，莫不悬验。”“鸠摩罗什博览五明诸论及阴阳星算，莫不必尽，妙达吉凶，言若符契。”“姚兴尝谓罗什曰：‘大师聪明超悟，天下莫二，何可使法种少嗣？’遂以伎女十人，逼令受之。尔后不住僧坊，别立廨舍。诸僧多效之。什乃聚针盈钵，引诸僧谓之曰：‘若能见效食此者，乃可畜室耳。’因举匕进针，与常食不别，诸僧愧服乃止。”

① 循后亦为刘裕所败。

其继，则以译籍开慧智，语上语下，胥可起人之信仰。此则吾国由无宗教而有宗教之故也。

（四）则东西交通之适合也。吾国东南皆滨海，以航海术之未精，往往求海上新地而不得。

《三国志》：“孙权黄龙二年，遣将军卫温、诸葛直，将甲士万人浮海，求夷洲及亶洲。亶洲在海中，长老传言，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，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，求蓬莱神山及仙药，止此洲不还，世相承有数万家。其上人民，时有至会稽货布。会稽东县人海行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。所在绝远，卒不可得至，但得夷洲数千人还。”^①

北方沙漠苦寒，人亦多不愿往。惟西方大陆绵亘无际，城郭之国，与汉俗同。

《汉书·西域传》：“西域诸国，大率土著，有城郭田畜，与匈奴、乌孙异。”

虽有身热头痛、绳行沙渡之险。

《汉书·西域传》：“皮山以南，国或贫小，乞匄无所得。又历大头痛、小头痛之山，赤土、身热之阪，令人身热无色，头痛呕吐，驴畜尽然。又有三池、盘石阪，道陋者尺六七寸，长者径三十里。临峥嵘不测之深，行者骑步相持，绳索相引，二千余里乃到县度。畜坠，未半阬谷尽靡碎；人堕，势不得相收视。险阻危害，不可胜言。”

然其行也有数道。

^① 《史记》言：“求三神山者，临之，风辄引去。”即缘航海术不精之故。

《汉书·西域传》：“自玉门、阳关出西域有两道。从鄯善傍南山北，波河西行，至莎车，为南道；南道西逾葱岭，则出大月氏、安息。自车师前王庭，随北山，波河西行至疏勒，为北道。北道西逾葱岭，则出大宛、康居、奄蔡焉。”^①

故自汉以降，交通不绝，而佛教自西而东，以大月氏、罽宾为转输之中心。

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：“大月氏为匈奴所灭，迁于大夏，分其国为……五部翎侯。后贵霜翎侯丘就却攻灭四翎侯，自立为王，国号‘贵霜’。侵安息，取高附地，又灭濮达、罽宾，悉有其国。丘就却年八十余死，子阎膏珍代为王。复灭天竺，置将一人监领之。”《地理志考证》（丁谦）：“印度史，西历纪元之初，鞑鞞^②在印度北境，立一大国，四邻咸服。其最名之王，名铅尼希加^③，以卡希米^④为都，属国甚多。南至亚格拉^⑤及沁特^⑥，北至耶根德^⑦、可根德^⑧云云，即指贵霜王父子。”《东洋史要》（日本桑原鹭藏）：“汉明帝永平三年，迦腻色迦王君大月氏，雅向佛法，会五百侣于罽宾，为四次集会^⑨，佛教徒多来集于大月氏。维时，北印度为佛教之中心，自西北两印度，经中亚，囊括葱岭以东、于阗、疏勒诸国，故天山

① 按此惟指新疆一方而言。据《史记·西南夷传》：“蜀布、邛竹杖，从身毒国来。”则川、藏间西行之道，当时已有踪迹矣。

② 即大月氏。

③ 即迦腻色迦之异译。

④ 即克什米尔。

⑤ 中印度地。

⑥ 西印度地。

⑦ 当即濮达。

⑧ 当即高附。

⑨ 其先已有集会三次。

南路未几佛法遂昌。会中国汉明帝出，锐意辟疆，与西域之关系滋密，佛法于中国境，浸获东渐之机。”

西僧之来中土者，多月氏、罽宾之人，而吾民之往彼者，始则仅诣其传播之区，继则直诣其发源之地。有往还皆遵陆者，有陆往而海还者，其道孔多。故所得于西方者，为他三方所莫及焉。

第二章 佛教入中国之初期

印度无历史，佛书亦不以纪年为要，故佛之时世，言人人殊。

《魏书·释老志》：“所谓佛者，本号释迦文者，译言能仁，谓德充道备，堪济万物也。释迦前有六佛，释迦继六佛而成道，处今贤劫。……释迦即天竺迦维卫国王子。天竺其总称，迦维别名也。初，释迦于四月八日夜，从母右胁而生。既生，姿相超异者三十二种。天降嘉瑞以应之，亦三十二。其《本起经》说之备矣。释迦生时，当周庄王九年。《春秋》鲁庄公六年夏四月，恒星不见，夜明，是也。至魏武定八年，凡一千二百三十七年云。释迦年三十成佛，导化群生，四十九载，乃于拘尸那城娑罗双树间，以二月十五日而入般涅槃。涅槃译云灭度，或言常乐我净，明无迁谢及诸苦累也。”①《释氏稽古略》（释赞宁）：“稽夫如来之生也，当此周昭王九年甲寅之四月八日。其出家也，当昭王二十七年壬申之二月八日。其成道也，当昭王三十三年之戊寅。其灭度也，当穆王三十六年壬申之二月十五日。”②《东洋史要》：“佛教祖师名瞿昙悉达多，一作乔答摩悉达，或号为释迦牟尼，中印度迦维卫国③王子也。生于周灵王之十五年，约与孔子、老聃同时。释迦见人类不能离生、老、病、死四者之苦，遂出家入山，求解脱法。新辟一宗教，力反婆罗门所为，唱说平等主义，扶差别种姓之藩篱，谓一切众生，不问其所自出，但能杜绝邪欲，脱

① 此引《正宗记》语。

② 今印度哥尔克波尔附近。

离世网，即皆可以于未来受无量福。以周敬王四十三年，入般涅槃。”

吾国固有之佛字，惟以仿佛为义，非以称释迦也。

《说文》：“佛，仿佛也。从人，弗声。”

后世附会之说，谓孔子时已知西方有佛。

《列子·仲尼篇》：“商太宰见孔子，问：‘三王五帝圣者欤？’孔子皆答以不知。商太宰大骇，曰：‘然则孰者为圣？’孔子动容有间曰：‘西方之人有圣者焉，不治而不乱，不言而自信，不化而自行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。丘疑其为圣，弗知真为圣欤？真不圣欤？’”

其言固不足为据。即谓西汉获休屠王祭天金人，为佛道流通之渐，

《魏书·释老志》：“汉武元狩中，遣霍去病讨匈奴。至皋兰，过居延，斩首大获。昆邪王杀休屠王，将其众五万来降。获其金人，帝以为大神，列于甘泉宫。金人率长丈余，不祭祀，但烧香礼拜而已。^①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。及开西域，遣张骞使大夏还，传其旁有身毒国，一名天竺，始闻有浮屠之教。”

亦不足为佛教入中国之证。

《休屠王金人考》（日本羽溪了谛）^②：“霍去病获金人时，当元狩二年（公元前一二一年），印度尚未有佛像之制作。印度史上有名之阿育王时

① 此吾国祭祀神鬼，以烧香为礼之始。

② 见《史林》第三卷第四号。

代（公元前二七二至二三二年）所建佛陀伽耶之摩诃菩提寺，始有雕刻。至公元前一二世纪制作之石垣石门，均无佛像。前者惟有佛座，后者只表佛足之形。缘其时学者，以为佛之形像，神圣不可亵渎也。其后至犍陀罗美术，始有佛像之制作，实当公元后一二世纪顷。故知公元前一世纪，无所谓金身佛像也。”

佛教之入中国，盖在西汉之末，东汉之初。

《魏书·释老志》：“哀帝元寿元年，博士弟子秦景宪，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。中土闻之，未之信了也。”

世或谓东汉明帝永平十年，始得佛经，说亦未确。

《释氏稽古略》：“佛教流通东土之始，永平七年，帝梦金人，长大，顶有白光，飞至殿庭。旦问群臣，太学闻人傅毅奏曰：‘周昭王时，西域有佛出世，其形长一丈六尺，而黄金色，陛下所梦，将必是乎？’博士王遵，推《周书》异记佐之。帝遂遣中郎蔡愔、博士秦景等十八人使西域求佛法。蔡愔等至天竺邻境月氏国，遇摄摩腾、竺法兰二人，奉佛经像来震旦，遂同东还。”^①《魏书·释老志》：“孝明帝夜梦金人，顶有白光，飞行殿庭，乃访群臣，傅毅始以佛对。帝遣郎中蔡愔、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，写浮屠遗范。愔仍与沙门摄摩腾、竺法兰东还洛阳。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，自此始也。”

盖蔡愔等永平十年始还，

《佛教西来玄化应运略录》（宋程辉）：“永平七年正月十五日，明帝

① 永平十年至京。

梦金人，遣王遵等十八人西访佛法，永平十年丁卯十二月，回洛阳。”

而楚王英在永平八年，已祠浮屠。

《后汉书·楚王英传》：“永平八年，英奉黄缣白纨赎罪。诏报曰：‘楚王诵黄、老之微言，尚浮屠之仁祠，洁斋三月，与神为誓，何嫌何疑，当有悔吝？其还赎，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饌。’”

足知佛法之来，决非始于愔等。惟译经造寺，始此时耳。

《魏书·释老志》：“愔得佛经《四十二章》及释迦立像。明帝令画工图佛像，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，经緘于兰台石室。愔之还也，以白马负经而至，汉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关西。摩腾、法兰咸卒于此寺。”《高僧传》（释慧皎）：“摄摩腾，本中天竺人，解大、小乘经。冒涉流沙，至乎维吕。明帝甚加赏接，于城西门外立精舍以处之。腾译《四十二章经》一卷，初緘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中。”“竺法兰，亦中天竺人。既达维吕，与腾同止。少时便善汉言，愔于西域获经，即为翻译，所谓《十地断结》《佛本生》《法华藏》《佛本行》《四十二章》等五部。移都寇乱，四部失本，不传江左，唯《四十二章经》今见在，可二千余言。汉地见存诸经，唯此为始也。”

摄、竺东来，既受优遇，故月氏、安息之高僧，接踵而来。

《高僧传》：“安清，字世高，安息国太子也。讽持禅经，备尽其妙，游方弘化，遍历诸国。以汉桓之初，始到中夏。才悟机敏，一闻能达。至止未久，即通习华言。于是宣译要经，改梵为汉，先后所出经论，凡